

十字路口的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人物：道德反思的收益

Tolstoy and His Characters at the Crossroads: The Benefits of Moral Reflection

刘亚丁 (Liu Yading) 汪义军 (Wang Yijun)

内容摘要：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托尔斯泰的人生际遇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从作家、人物和叙述者的角度，对列夫·托尔斯泰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献考察托尔斯泰 1851 年春季去高加索从军，以阐明此举所标志的弃恶从善人生转折的伦理选择意义。《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别素霍夫在个人生活、个人精神和个人与社会等伦理线中陷入了伦理结，他作出了一系列伦理选择。托尔斯泰与其塑造自传性主人公彼尔·别素霍夫具有相似性。在托翁的小说中，叙述者既有表达正面的道德纯洁性的特点，亦有叙述者道德感含混甚至倒错的情况。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伦理线

作者简介：刘亚丁，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汉学；汪义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及文学理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项目批号：17ZDA283】、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2020 年课题“中俄文化关键词比较研究”【项目批号：SC2020ZDZW006】、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2019 年重点项目“《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文学·语言文字卷》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2019ZHWH-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olstoy and His Characters at the Crossroads: The Benefits of Moral Reflectio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Leo Tolstoy's life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creation are of great value. This paper examines Leo Tolstoy's literary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riter, character and narrator. Leo Tolstoy left his hometown to join the army in the Caucasus in the spring of 1851, by means of documentary mutual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thical choice of this move which marks the turning point of Tolstoy's life from evil to good. The entangle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rotagonist of *War and Peace*, Pierre

Bezukhov, in such ethical lines as his personal life, personal spirit and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his ethical complex, lastly in his ethical choice, has important ethical value. In the ethical choice, Leo Tolstoy and his autobiographical character Pierre Bezukhov are similar. In Leo Tolstoy's novels, the narrato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ing positive moral purity, and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the narrator's moral sense is ambiguous or even wrong.

Keywords: Leon Tolstoy; *War and Peac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ethical line

Authors: **Liu Yading**, Ph.D.,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ussian Sinology (Email: liuyading2007@163.com). **Wang Yijun**,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nd a teach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445000,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wangyijun211@foxmail.com).

1856年托尔斯泰刚刚走上文学道路,发表其最早的作品的时候,俄国的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已然发现:“托尔斯泰伯爵的才华,还有另一种力量,它以自己罕有的清新气息,而赋予他的作品以十分特殊的美质,这是道德感情的纯洁性”(倪蕊琴33)。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判断十分准确,道德感情的纯洁性,不但是托尔斯泰早期文学作品的显性标志,而且可以说是贯穿其主要作品的一条精神脉络。托尔斯泰的人生追求,也以道德完善相标榜。正因为如此,对这位俄罗斯作家的人生际遇和文学作品展开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俄罗斯、苏联和西方都有从伦理的角度来评价和研究列夫·托尔斯泰著述,认真梳理这些资料,既可以深化对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研究,也可以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新的材料。1887年P.A.季斯捷尔洛(P. A. Дистерло)出版了《作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托尔斯泰伯爵》(*Граф Л. Н. Толстой как художник и моралист*),他几乎是在作家刚刚发表作品之后,就通过剖析《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中篇小说,全面探讨托尔斯泰是如何通过艺术手段来表达其道德观的。在苏联时期,Г. Я.加拉刚(Г.Я.Галаган)在1983年出版了《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探索》(*Л. Н. Толст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этические искания*),该书以动态追踪的方式阐释托尔斯泰的艺术道德体系。该书的作者以罪过与善行、现存的世界和应该的世界为线索,通过追溯列夫·托尔斯泰认识文化和哲学的历史的过程中阐发

他艺术和道德世界。1995年C. J. G. 特纳 (C. J. G. Turner)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心理学、修辞学和道德性：在谁的心灵深处？》(“Psychology, Rhetoric and Morality in Anna Karenina: At the Bottom of Whose Heart?”) 一文中小题大做，通过对这部长篇小说中包含“心灵深处”文本细节的剖析，揭示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中所推出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著述是研究托尔斯泰作品道德书写的学术资源，值得认真吸取，但也留下了接续研究的空间。文学伦理批评为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原理和工具，本文拟揭示列夫·托尔斯泰本人的伦理选择与《战争与和平》中的别素霍夫的伦理选择的内在关联，探讨其作品叙述者的道德态度，这应该是具有新意的学术工作。

一、作家：托尔斯泰以理性超越纵欲的伦理选择

列夫·托尔斯泰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与伦理的关系极为密切。对其人生经历展开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主要的意义。托尔斯泰作为富有的贵族，在其人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伦理境遇，其个人的伦理选择非常重要。这里以他的伦理选择中的一个伦理结为例，以展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特功能。

1851年4月，时年22岁的贵族青年托尔斯泰离开了自己的庄园去高加索，在与反叛山民作战的前线部队里当了一名义务士兵。笔者所掌握的有关托尔斯泰学者们所写的托尔斯泰传记，对托尔斯泰人生中道路的这一转折，往往言及，但多系语焉不详，让人不明就里。对托尔斯泰在重要人生十字路口的伦理选择，不能不详加探究。

当时列·托尔斯泰的伦理困境，学者们有所涉及，却又有所隐晦。多数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对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到去高加索从军期间（1847年4月-1851年4月）4年生活的状况，尤其是他负面的生活方式，往往有所暗示，但语焉不详。比如，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如此写道：

托尔斯泰整整有四年时间——从一八四七年四月到一八五一年四月，都在寻求一种固定的事业上。当地主他当不来〔……〕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莫斯科过了几个月生活，过得很散漫，既无职务，又无工作，也无目的。（贝奇科夫 17）

这里贝奇科夫已经略为触及了托尔斯泰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伦理困境，但说得云遮雾罩，让人不明就里。维·什克洛夫斯基 (В. Шкловский) 的《托尔斯泰传》(Лев Толстой) 对这个时期也有表述：“年轻的托尔斯泰在狂热的情欲和高阶位的美德之间摇摆不定” (Шкловский 109)¹ 实际上也语焉

1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不详。显然，这些传记的作者虽然触及了托尔斯泰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可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他们却绕开走了。

托尔斯泰传记的作者们既有所回避，未能清晰地描述他的伦理困境的全貌，又未曾意识到他的伦理选择的意义。职是之故，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传记文献，展开文学伦理批评。笔者勾稽相关的传记片段，参照托尔斯泰的日记和书信，还原他离开亚斯纳亚·波良纳时面临的伦理困境，呈现他所作出的伦理选择。英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家、《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的翻译者莫德，对列·托尔斯泰去高加索作了这样的解释：“列夫急于要节省费用，偿付赌债，特别是欠奥加罗夫四千卢布，他决定趁他哥哥关于回去的时候，和他一起去高加索”（莫德 56-57）。莫德还认为，托尔斯泰去高加索从军，还有一个原因是“试图摆脱吉普赛女人的诱惑”（莫德 56-57）。列夫·托尔斯泰的挚友、他的文学遗产的出版者巴维尔·比留科夫（П. Бирюков）1906年出版了《托尔斯泰传》（*Л. Н. Толстой. Биография*）第一卷，对托尔斯泰赴高加索前的生活状态这样写到：“在这三年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实际上尝试了生活中的一切，年轻人的强烈的情欲所能够达到的生性中的一切”（Бирюков 156）。比留科夫引用了托尔斯泰1851年春天致姑母塔吉亚娜·亚历克山德拉的信：

尼古拉回来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因为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家里见到他的希望了。〔……〕我现在又是一个人，彻彻底底一个人，哪里也不去，谁也不见。我正在制定春季和夏季的计划，您是否赞同这些计划？5月底我去雅斯纳亚，在那里待一两个月，还要争取留住尼古拉，然后尽可能跟他一起到高加索溜一溜。（Бирюков 161）

这里透露出了托尔斯泰本人打算与其长兄尼古拉去高加索的意图。托尔斯泰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究竟是什么，值得进一步深究。

应该借助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所提出的“斯芬克斯因子”，以阐明托尔斯泰的伦理困境的实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提出了“斯芬克斯因子”，认为：

“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斯芬克斯因子能够从生物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说明人的基本特点，即在人的身上善恶共存的特点。（聂珍钊 38）

当时托尔斯泰所面临的伦理选择是，要么发挥人性因子，走向善之路，要么就是兽性因子支配，甘愿堕落。在发挥人性因子方面，当时托尔斯泰有所努力：他从喀山大学主动退学后，一方面开始自修，想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学位。可是这样的努力，很快被兽性因子给掩盖了。他染上了赌博的习气。“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居住期间（1848-1849）除了在耽于上流社会生活而外，还开始了斗牌赌博。他赌得非常厉害，非常冲动，总是输越输不计后果”（Гусев 235）。1849年托尔斯泰在圣彼得堡，他继续赌博，据他们的朋友证实，一次列夫在弹房里跟计分人赌博，他输光了所有的钱，他承诺次日去还赌债，但弹子房计分人不答应，把他扣押在俱乐部里，直到托尔斯泰的朋友来交了赌债，才放了他。

托尔斯泰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的危机程度，也透露出了他伦理选择中的两种意向。1850年12月8日他写到：“输给了奥加廖夫，此人掌控了我的事务，造成了极端的混乱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完全没有纠正的希望了”（Толстой, Т.46, С.38）。1849年5月1日，列夫·托尔斯泰给他的次兄哥哥谢尔盖写信：“你无法相信，现在让我最苦恼的就是债务，假如我不尽快偿还这些债务，那我就破产，就会声名狼藉。（……）我现在必须要3500银卢布的进账，其中1200卢布已经归零了，1600卢布用来还债；700卢布用来维持生活”（Толстой, Т.59, С.44）。他在信中直接提出把他自己名下的沃洛腾卡庄园和部分林产以及马匹卖掉：“看在上帝的份上，做这样一件事，不要告诉姑妈、姨妈，不要告诉安德烈，把沃洛腾卡买给乌瓦罗夫和谢列兹廖夫”（Толстой, Т.59, С.44）。这里已经涉及到列夫·托尔斯泰所作的道德选择的相对消极的意向：通过还债来摆脱伦理困境，借此来筹措他度过难关的经费。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表明了伦理选择的积极意向：“上帝保佑，我能改过自新，做一个正派的人，我特别想到士官兵里去服役。当士官兵可以教会我务实地生活，顺利的话，我还可以挣到军衔”（Толстой, Т.59, С.45）。显然，列夫·托尔斯泰努力争取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抑制兽性因子，张扬人性因子。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材料看，列夫·托尔斯泰是在他们的哥哥们的促进下，作出了决定性的伦理选择。1849年下半年，谢尔盖·托尔斯泰由于受列夫·托尔斯泰委托要卖掉沃洛腾卡庄园，因为牵扯到法律手续，需要列夫·托尔斯泰的同辈兄弟姐妹的委托书，于是他跟在高加索前线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托尔斯泰写了信。这样长兄尼古拉·托尔斯泰自然就知道了弟弟列夫·托尔斯泰的赌博恶习。加之，列夫·托尔斯泰本人在上述1849年5月1日的信中表示：他愿意参军，愿意改过自新。可以推断，谢尔盖·托尔斯泰和尼古拉·托尔斯泰曾暗中商量“拯救”列夫·托尔斯泰的方法：就是让尼古拉·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回来，利用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表示过想当兵的愿意，把他带到高加索前线去，这样才能把列夫·托尔斯泰从他习惯了的、使之堕落的环境

中救拔出来。列夫·托尔斯泰自己也对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生厌倦，试图换一个生活环境。于是就发生了列夫·托尔斯泰人生的大转折：三年未曾回家的尼古拉·托尔斯泰，在1850年12月22日回到图拉休假，1851年4月底他把列夫·托尔斯泰带到高加索去当了一名志愿兵。B.什克洛夫斯基在其《托尔斯泰传》中写到：“亲爱的兄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他带走时没有感到任何抵抗之举”（Шкловский 122），他所暗示的正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所作出的最重要的伦理选择，在其人生道路上最主要十字路口选对了方向。假如不曾发生尼古拉·托尔斯泰从高加索返回家乡休假，把列夫·托尔斯泰带到高加索，那么后者的人生道路就会维持原状。尽管他不乏发挥人性因子的愿望，试图通过自考获得学位，但是上流社会的环境会让继续受到兽性因子的支配：他会继续赌博、骄奢淫逸。假如是这样的话，俄国的贵族社会就会增添一个叫列夫·托尔斯泰的花花公子，而俄国文学界就不会出现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由于列夫·托尔斯泰被兄长带到高加索，他作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克服赌博等恶习，走上了文学创作和道德自我完善之路。应该从伦理选择的角度来观照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个人生十字路口的意义。文学伦理学批评学认为：“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罪行证明，即使人在获得理性之后，人身上仍然存在着由斯芬克斯的狮身所体现的兽性因子，人仍然有作恶的可能”（聂珍钊 41）。列夫·托尔斯泰原本受制于人的本性，过分放纵物欲的生活状态几乎毁掉了他的“前程”，当他被其兄带到高加索之后，他恢复了理性的人的本性，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此后，列夫·托尔斯泰一方面参加军队的行动，另一方面开始实现他早已渴望的写作计划。从1851年11月开始，到1856年11月申请退役这五年间，列夫·托尔斯泰先后写作并发表了《童年》《袭击》《台球房记分人笔记》《少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伐林》《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两个骠骑兵》等作品，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摆脱了贵族恶习对自己的毁伤。这样，托尔斯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两位胞兄的促进下半自主地完成了以理性超越纵欲的正确的伦理抉择。

二、人物：彼尔·别素霍夫三条伦理线和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从伦理线入手来考察人物的复杂的伦理状态：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ethical line），一个或数个伦理结（ethical knot or ethical complex）。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同伦理结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横向伦

理结构。在对文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伦理结被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串连或并连在一起，构成文学文本的多种多样的伦理结构。（聂珍钊 14）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用多副笔墨来描写男主人公彼尔·别素霍夫。季斯捷尔洛对托尔斯泰描写人物的复杂性的概况，非常适合用来关照彼尔·别素霍夫：“他（指托尔斯泰）在展示人的善良、幸福和高尚的同时，不会忘记揭示与人的无法摆脱的生活规律相联系的邪恶、痛苦、丑陋和猥琐”（Р. А. Дистерло 110）。彼尔·别素霍夫就是这样被托尔斯泰推到了前景，他带着复杂的人性，面临着复杂的伦理环境，他不自觉地走到了关于精神安顿和思考民族命运的一个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多条伦理线：个人世俗生活的伦理线、个人精神的伦理线和个人与社会的伦理线，在多个伦理结中挣扎、纠结和决断，不得不作出伦理选择。

彼尔·别素霍夫在个人生活中有其伦理线和相应的伦理结，主动或被迫做出了伦理选择。小说刚开始的部分就陷入了极端的世俗生活的伦理困境，就是他自己从理智上明知兽性因子之邪恶，由于他自己意志薄弱，也由于他人的怂恿和诱惑，难以摆脱兽性因子，因而在比较长的时期未能幡然醒悟，不能让人性因子焕发出来。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册的第一卷，彼尔·别素霍夫正处于人生的重要的十字路口。彼尔·别素霍夫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当时俄国最富有的贵族，很喜欢他，把他送到法国去留学。他二十岁时回到俄国，住在莫斯科的父亲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到京城圣彼得堡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职业。他在圣彼得堡住在亲戚瓦西里·库拉金家里，不能确定究竟该以什么为职业，反倒是与一帮不成器的贵族子弟厮混在一起，干下了荒唐的勾当：他们找到一头熊，把它载在马车上，带着熊去看几个女演员，警察来干涉他们，他们就把警察和熊背对背捆绑起来，扔进运河里，熊驮着警察游泳起来。事后，与彼尔·别素霍夫一起胡闹的当军官被处罚，他本人溜回了莫斯科。在这里，作家托尔斯泰所塑造的文学形象遭遇了伦理困境：一个青年贵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具有多种可能性。他自己彷徨不知所措，他周围的人都想形塑他，通过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我们看到试图对他产生正面影响者有之，如他的挚友、作品的另一位男主人公安德列·保尔康斯基问他：“你究竟做了什么决定呢，你是去做近卫军呢，还是去做外交官？”（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40），这实际上是给他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即或当文官，或从军。安德列·保尔康斯基还劝他不要再去瓦西里·库拉金家，“不要再过那种生活。与你非常不相宜，这里所有的荒淫，放荡，以及其他种种”（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50）。彼尔·别素霍夫也答应，不再去库拉金家，他对安德列·保尔康斯基说：“过着那样一种生活，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决定，什么事情也不能考虑。使人头痛，就用掉所有的钱”（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50）。这里就把伦理选择的可能性摆在了彼尔·别素霍夫面前，或者像安德列·保

尔康斯基建议的那样，彼尔·别素霍夫就可以彰显人性因子，走上人生的正途；或者不听他的规劝，继续沉溺于兽性因子。

彼尔·别素霍夫在离开安德列·保尔康斯基之后，经历了一次伦理选择：听从这位好友的规劝，远离那些负面的朋友，还是与他们再狂欢一次。对此，托尔斯泰作了非常详尽的描写：

在路上，彼尔记起来，平常聚赌的那帮人，今天晚上要在阿那托里·库拉金家里斗牌，散牌以后，总要喝一大顿酒，然后用彼尔十分爱好的一种逛地方来收场。‘我倒是很想去库拉金家，’他想到。但是他立刻想起他对安德列王爵作过的不去那里的诺言。随后，正如意志薄弱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他那么热烈地想再享受一次他非常习惯的放荡生活，于是他决定去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51）

彼尔·别素霍夫到阿纳托尔·库拉金家里去了，在那里喝酒、狂欢，用坐在倾斜的窗台上喝酒的冒险来打赌。在这里，作家对彼尔·别素霍夫下述行为的描写特别耐人寻味：“于是他捉住那头熊，先把它抱在怀里，又把它举起来，然后搂着它在房子里跳起舞来”（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56）。彼尔·别素霍夫身上的兽性因子，在这个细节中得到了隐喻式的展现。

正是在这种兽性因子的支配下，彼尔·别素霍夫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又面临了新的伦理结。他父亲在临死前把全部财产遗赠给他，瓦西里·库拉金为了从这笔巨大的财产中分一杯羹，把他带到彼得堡自己的家里。他因此陷入安德列·保尔康斯基所指出那种负面的环境中，他面临了另一次严峻的伦理选择：娶还是不娶瓦西里·库拉金貌美却品行不端的女儿爱伦。一方面，在瓦西里·库拉金、舍雷尔的暗示下，在爱伦的诱惑下，彼尔·别素霍夫倾向于娶爱伦为妻子。在舍雷尔的客厅的角落里，彼尔·别素霍夫处于与爱伦的近距离接触中，“他觉出她的体温，闻见她的粉香，听见她移动时她的胸衣。他看不出跟她的衣服形成的大理石之美，只看得出她的衣服遮起来的身体的全部诱惑力。一旦看出这一点，他就不能不这么看（……）彼尔觉得，爱伦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做他的老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342）。显然，让彼尔·别素霍夫产生这样的感觉、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恰恰就是兽性因子主导他作如是想。另一方面，他也有犹豫踟蹰：“‘但是她很蠢，’他想到。‘他在我内心引起的感情中，有一种恶心的东西，有一种不对的东西。我听说过，他哥哥阿纳托尔爱上了他，她也爱上了他，丑闻四播，所以他被打发走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344）。在这样的念头中，彼尔·别素霍夫又觉得应该放弃与爱伦的结婚的念头。在这里，彼尔·别素霍夫内心的想法是符合人类基本伦理规范的，比如对乱伦的谴责和弃绝，这是理性因子在支配他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彼尔缺乏自我意识，缺乏摆脱负面环境的能力，落入了瓦

西里·库拉金的圈套，再次作出错误的伦理选择，稀里糊涂地与爱伦结了婚。在此我们发现，小说主人公的伦理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拿彼尔·别素霍夫来说，他自己的愿望是主要因素，他周围人的诱导和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尔·别素霍夫还处于个人精神的伦理线中。他在个人生活中的失败的伦理选择，导致他转向新的伦理选择，即寻求个人精神安顿的伦理选择。彼尔·别素霍夫在与妻子爱伦·库拉金娜结婚后，听闻妻子爱伦与人有染的丑闻，他与朵罗豪夫决斗，然后与她分居。此后他被吸引到共济会中。在与共济会的人员的对话中，他历数了自己的种种罪孽。在共济会的演讲中，他提出：“我们应该使德行压倒罪过，诚实的人也应该因了他的德行而受到永久的奖励”（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725）。这表明，他已经在选择清除自己的精神之恶，趋向精神之善。共济会并没有终结他的伦理选择。他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什么缘故，世界现势怎么？’他每天有好几次问惶惑地自己道，不自觉地又开始反省人生现象的意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900）。

后来，在彼尔·别素霍夫精神性的伦理选择是在法国人占领的莫斯科完成的。当时他试图刺杀拿破仑，此事未果却被法军俘虏，还差一点被法国人枪毙。“这时他觉得宇宙已经在他面前垮了，只留下没有意义的灰烬。（……）他觉得恢复对人生意义的信仰，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620）。他被关进教堂里。在那里他遇到了农民出身的俄国士兵普拉东·加拉塔耶夫。在他通过支言片语所表达出来的朴素的、充实的观念中，彼尔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听躺在他旁边的普拉东的均匀的鼾声，于是他觉得那个已经破碎了的世界，又带有一种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灵魂中活动起来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625）。彼尔听了加拉塔耶夫讲述商人自愿为不曾犯过的罪行负苦役的故事，“于是彼尔的灵魂被模糊地快乐地填满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786）。B.林科夫认为：“毫无疑问，彼尔从加拉塔耶夫那里找到了对重要问题的答案，因为他而迈出了自己精神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Линков 92）导致彼尔·别素霍夫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农民，正是农民让他意识到：究竟该选择农民式的生活方式，还是维持贵族地主的生活方式。彼尔·别素霍夫的选择就是，以农民的朴质、善良来对治贵族的堕落与骄奢淫逸，从而获得精神安顿，其伦理学的意义十分明显。

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尔·别素霍夫还处于个人与社会的伦理线中，他还进行着另一路径的探索，即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聂珍钊13）。彼尔·别素霍夫的思想

考和行为涉及到由贵族的庄园经济、俄罗斯国家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其实质是社会发展趋势还是向善的伦理选择。彼尔·别素霍夫去视察他在基辅省的庄园，他的伦理选择是，是维持旧有的贵族地主对待农民的方式，还是提出解放自己庄园的农奴的主张？他选择的是后者：“他们对他说，要采取立刻解放他的农奴的步骤——到那时，不要他们过劳，不要派奶孩子的女人去做工，要援助农奴们，惩罚限于训诫而非拷打，要在所有的庄子上建立医院，养育院和学校”（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627）。彼尔所提出的措施，并非1861年所实行的那种自上而下的解放农奴制度性安排，仅仅是一些改善农奴的生活状况的设想，而且管家们糊弄他，完全不予实施。因此彼尔·别素霍夫所提出的这些主张，不过是他心地良善的例证而已。在《战争与和平》结局中，彼尔·别素霍夫到彼得堡办事一呆就是七个星期，在1820年12月5日返回他们家当时所在的童山庄园，他当着家人和亲友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参加了狄奥多公爵所发起的团体，试图把国家从阿拉克切耶夫的军棍的统治中拯救出来。托尔斯泰对彼尔·别素霍夫的这个结局的描写是对他的十二月党人身份的暗示。俄罗斯托尔斯泰研究家A.萨布罗夫指出：“在彼尔形象的定稿中某些十二月党人的特征明显地表达了出来。（……）在小说的总体布局中也能看出其中心主人公是十二月党人的最初构思”（Сабуров 177）。托尔斯泰暗示彼尔·别素霍夫参与十二月党人的行动，这意味着他在社会或国家的发展领域的伦理选择是，扬弃俄罗斯传统的专制主义，趋向现代的发展形态。

从彼尔·别素霍夫所面临的三个伦理线来看，它们是互相联系的。彼尔·别素霍夫在个人生活中作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这个选择的结果导致他进行新的选择：他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那里获得的是个人精神之善，即重建自身的道德秩序。接下来在个人与社会的探索中，他从圣彼得堡返回之后所表达的则是对民族之善的追求，即试图重建民族的道德秩序。因此，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集中展现了彼尔·别素霍夫在三条伦理线中的伦理选择，把他对个人世俗生活的实践，对个人精神安顿的找寻、对民族发展方向探索融为一炉，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伦理选择呈现出由个人的小世界向社会国家的大世界转化的过程，总体伦理选择趋势是弃恶向善。

三、叙述者：复杂的伦理态度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叙述者对受述者的伦理态度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隐含的叙述者对受述者作明确的、符合日常伦理的评价是常态，但也有隐含的叙述者或内部的叙述者违背日常伦理、颠倒普遍善恶观的例外状况。

如何看待隐含叙述者对受述者的伦理状况的评价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考察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叙述者对人物的评判，似乎会对传统叙述学提出挑战。在多数叙事学著作中，对道德问题鲜有触及。即使布斯有所论列，

也遭到同行抵制。如西摩·查特曼指出：“隐含作者建立了叙事准则，但布斯关于这些准则乃道德准则的主张看上去却并非必要”（查特曼 133）。俄罗斯学者很少从叙述学来研究托尔斯泰的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在硕果仅存的文章中——《列·尼·托尔斯泰长篇小说中的叙述者和人物》（*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 и персонаж романах Л. Н.Толстого*）中，E. A. 波波娃（E. A. Попова）在对托尔斯泰的叙述者作了技术分析，对托尔斯泰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有比较全面的讨论，但波波娃仅限于用哪些连词等“技术问题”，丝毫不涉及善恶评判。¹ 托尔斯泰小说有一个重要特征——隐含作者时时会对受述者作道德评判。C.J.G. 泰纳对托尔斯泰作为叙述者的概括是准确的：“在人物的意识对自身的毛病浑然不觉的时候，托尔斯泰总是在对他们进行道德描述”（C. J. G. Turner）。在《战争与和平》的四大贵族家族中，读者能够明显地感到隐含的叙述者对库拉金家族的负面感观，尤其是，对其家长伐西里·库拉金则多次明确给予负面的评价。在《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十二章里，隐含的叙述者叙及老库拉金与安娜·米哈伊罗芙娜对话：

“能为您效点劳，我很高兴，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罗芙娜，”伐西里王爵整理着他的皱边说道，他在声调上和态度上所表现出的神气，比起在彼得堡安娜·舍雷尔的招待会上所表现的神气来，自尊自大得多。（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84-85）

— Я рад, что мог сделать вам приятное, любезная моя 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 сказал князь Василий, оправляя жабо и в жесте и голосе проявляя здесь, в Москве, пред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уемой Анною Михайловной еще гораздо бoльшую важность, чем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на вечере у Annette Шерер. (Толстой, Т.9, С.60-61)

与瓦西里·库拉金相比，安娜·米哈伊罗芙娜地位低下，并且当时她有求于他，隐含的叙述者特地点出了瓦西里·库拉金态度的“自尊自大”（*большую важность*）。“*важность*”在奥热科夫《俄语词典》中的第二个义项是“傲慢和自大的行为和态度”。²

再如，作品中写老库拉金准备带儿子阿纳托尔去向老保尔康斯基家的儿女求婚，他给后者写信暗示此事。在老保尔康斯基读了老库拉金谈及此事的信后，隐含的叙述者写到：“老保尔康斯基从来就看不起伐西里王爵的品格，但是近来，自伐西里王爵在保罗和亚历山大两朝取得高官厚爵以来，就更加

1 См. E. A. Попова.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 и персонаж романах Л. Н.Толстого //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2, 2010. 14-19.

2 См. С. И. Ожеков.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словарей. 1963. С. 63.

看不起”（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357）。在托尔斯泰《复活》的一种异稿中，隐含的叙述者这样描述法院的庭长：“庭长尼基金是个无所事事的家伙，因受永不餍足的虚荣折磨而显得冷漠、恶毒、高傲”（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Никитинъ былъ бездѣтный челоуѣкъ, холодный, злой, гордый и снѣдаемый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ымъ честолюбиемъ.）（Толстой, Т.33, С. 203）足见，隐含的叙述者对受述者给予道德性的评断，是托尔斯泰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有必要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的叙述者的伦理观未必总是与主流的伦理观尽相契合，笔者发现了一些叙述者伦理观含混甚至倒错的例证。托尔斯泰的1889年发表了《克莱采奏鸣曲》（*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这部中篇小说基核心情节是乘火车的“我”听到另外一位乘客的自我讲述，此人是贵族波兹德内谢夫，他因为厌烦和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一直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塔玛·雅比克在《作者的修辞、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相异的解读：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一文中，从存在机制、功能机制、文类原则、视角和生成机制讨论了这部作品，指出：“当一种视角阅读（波茨金谢夫¹是可靠的）转向其对立面（他是不可靠的）甚至转向生成性失败时，整合逻辑本身以及文本的权力结构（作者高于中介叙述者，波茨金谢夫是托尔斯泰的造物）仍然具有力量”（费伦 121）。雅比克的讨论比较复杂，不妨返回作品文本本身来把握叙述者的伦理态度。在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中，去掉作为中介的第一叙述人，去掉偶尔参与对话的旅客，基本上就是波兹德内谢夫的自述，他实际上充当了内部的叙述者。作为叙述者的波兹德内谢夫不断“论证”自己杀妻的“合法性”：“你知道什么最可恶，从理论上说，爱情是一种理想的、崇高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是一种丑恶的、愚蠢的事情，说起来和听起来都叫人厌恶和羞耻”（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296）。波兹内谢夫为他杀妻“找到”了“理由”：“她脸上除了恐惧和对我仇恨而外，我至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表情。这种恐惧和仇恨一定是对别人的爱情引起的。假如这时她不说话，也许我还能控制自己，还不会做出我随后做出的事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345）。我们还可以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早期的自传性作品中看到类似的情况，《青年》采用的是主人公尼古连卡的第一人称叙述，在“我准备出门拜访”一章中“我”的势利、“我”对出身、地位不如自己的伊林卡的刻薄和嘲弄，是用洋洋自得的语气来讲述的。总之，不能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的所有叙述者都当成正常的道德观的秉持者。

从伦理选择的角度看，托尔斯泰本人与他塑造的文学形象——自传性主人公彼尔·别素霍夫，具有相似关系。托尔斯泰在个人生活中受兽性因子的支配，曾沉溺于赌博恶习，后因自己的改过自新的正面伦理意识，尤其是其兄长们的助力，他最终作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以理性超越了纵欲，人性因

1 即波兹德内谢夫。

子得以回归，以后逐渐走上了道德自我完善之路，成为了伟大的作家。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写作生涯中，他始终以自传性的主人公来继续进行伦理探索，将让他自己反复考虑的伦理选择投射到自传性主人公身上。¹加拉刚在其专著《列·尼·托尔斯泰：艺术与伦理探索》中指出：“彼尔生活中的这种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托尔斯泰本人在比较自身的‘思维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绝望、‘生命的停滞’是完全相似的”（Галаган 9）。在文本的第一部分我们梳理了托尔斯泰一生中关键的一次伦理选择，但这次伦理选择并没有终结他的伦理困惑，因此他把自己人生中不断出现的伦理困惑投射到一个个自传性主人公身上，自然也投射到了自传性主人公彼尔·别素霍夫的身上，让他们不断进行伦理选择。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尔·别素霍夫也曾沉溺于动物因子，热衷于放荡生活，这种描写与作家自身所经历的伦理困境是相近的。后来彼尔·别素霍夫在个人精神领域和人与社会的领域的伦理选择是弃恶向善。这也与托尔斯泰自己后来的伦理选择不乏相似之处。作为作家的列夫·托尔斯泰与作品中叙述者的伦理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作为作家的列夫·托尔斯泰时时彰显善，但其作品中叙述者对待受述者总体上体现为善，有时却未必抱持善念。在伦理观上作家与叙述者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Works Cited

- 莫德·尔默：《托尔斯泰传》，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
[Aylmer, Mod. *Life of Tolstoy*. Trans. Song Shubi and Xu Chi.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4.]
- Бирюков, П. Л. Н. Толстой. Биография. Т. 1, Москва, «Посредник», 1906.
[Biliukov, P. L.. *Biography of Tolstoy*. Moscow: Intermediary Press, 1906.]
- 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吴钧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Bychkov, C. L. *Tolstoy, An essay of creativity*. Trans. Wu Junxi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Галаган, Г.Я. Л. Н. Толст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этические искания.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1.
[Galagan, G. Ia.. Л. Н. *Tolstoy: Exploration of Ideology and Morality*. Leningrad: Leningrad Branch of Science Press, 1981.]
- Гусев, Н. Н. Л. Н. Толст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28 по 1855.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4.
[Gusev, N. N.. Л. Н. *Tolstoy's Biographical Materials (1828-1855)*. Moscow: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1954.]
- Линков, В. Я. Бытие к бессмертию. Книга о Льве Тостом. М.: «Либроком», 2014.
[Linkov, V. Ia. *Being and Immortality: A Book about Leo Tolstoy*. Moscow: Librocom Press, 2014.]

¹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系列自传性人物形象的基本状况及其精神探索等问题，参见刘亚丁：“列·托尔斯泰的自传性形象系列”，《社会科学战线》2（1982）：293-298以及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249-253。

倪蕊琴选编：《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Ni Ruiqin. *In the Criticism of Leon Tolstoy by Russian Writer and Critic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2. 3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Phelan, James and Peter J. Rabinowitz.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Trans. Shen Dan and Ma Hailia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07.]

Шкловский.В. Лев Толсто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3.

[Shklovsky. V. L. N. *Tolstoy*. Moscow: Young guard Press, 1963.]

Сабуров, А. А. «Война и мир»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9, стр.177.

[Subrov, A. A. “*War and Peace*” by L. N. Tolstoy. *Problematics and Poetics*. Moscow: Moscow UP, 1959.]

Дистерло, Р. А. Граф Л. Н. Толстой как художник и моралист. СПб.: тип. Лебедева, 1887.

[Tisterlo, R. A.. *Artists and Moralists* Л. Н. Count Tolstoy. St. Petersburg: Lebedev Printing Factory, 1887.]

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吴育群、单继达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

[Tolstoy, Leon. *Selected short Story and Novella of Tolstoy*. Trans. Wu Yuqun and Shan Jida, et al. Guangzhou: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83.]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Tolstoy, Leon. *War and Peace*. Trans. Dong Qius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uose, 1982.]

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ом 9, 1937.

[Tolstoy, Lev Nikolaevich. *Full composition of writings* vol.9.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Literature”, 1937.]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33, 1935.

[—. *Full composition of writings* vol.33.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Literature”, 1935.]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46, 1937.

[—. *Full composition of writings* vol.46.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Literature”, 1937.]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59, 1935.

[—. *Full composition of writings* vol.59. Moscow: State Publishing House “Literature”, 1935.]

C. J. G. Turner, “Psychology, Rhetoric and Morality in Anna Karenina: At the Bottom of Whose Heart?”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39, no. 2, 1995.